



# 鹤影诗心：中唐文士生活史一瞥

□ 戴伟华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人类对鹤的认识是多样而不断丰富的。鹤在雅俗世界中,其生物属性和文化意涵始终保持一定距离。鹤前冠以“仙”字,成了“仙鹤”,人和仙之间有质的差异。在世俗的视野里,鹤或许只是自然界中一种优雅而高贵的鸟类,以其独特的形态和习性吸引着人们的眼光。鹤的形象虽然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往往更多地被赋予吉祥、幸福的寓意。但这种世俗化的鹤形象,相较于仙鹤的超凡脱俗,显然少了一份神秘和深邃。由于鹤的寿命相对较长,白鹤和丹顶鹤的寿命甚至可以达到80至100年,因此人们常将鹤与长寿联系在一起。在传统文化中,鹤与松树一起出现,寓意着“松鹤延年”,表达了人们对长寿和健康的期盼。

在雅文化中,仙鹤是长寿、吉祥和高雅的象征。道家文化中,仙鹤常被视为仙人的坐骑,穿梭于云雾之间,代表着超凡脱俗、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文人墨客也常以鹤为题材,通过诗词歌赋、书画作品来表达对高洁、清雅品质的赞美和追求。在这些艺术作品中,仙鹤或展翅高飞,或悠然自得,无不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洒脱不羁的气质。

养鹤成了文士生活的日常,让人记起的是“梅妻鹤子”的文人逸事。“梅妻鹤子”的故事源自北宋时期的著名隐士林逋。林逋,字君复,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出生于儒学世家,早年曾游历于江淮等地。他生性恬淡,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非常厌恶社会上那种阿谀奉承、追逐名利的风气,于是便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山中隐居起来,过着清闲自在的日子。林逋的脾气非常古怪,既不娶妻,也不要孩子,却特别喜爱梅花和仙鹤,在房前屋后遍植梅树,养了好几只白鹤。他常常把白鹤放出去,任它们在云霄间翻腾盘旋,自己就坐在屋前仰头欣赏。周围的人说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他写的《山园小梅》其一被人激赏:“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这首诗描绘了梅花在众芳凋零时独自绽放的美丽姿态,以及其清幽的香气和迷人的神韵。其中颌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确实写尽了梅花的姿态和香气,后人写梅于此可以搁笔。“疏影横斜”写写出了梅花的轻盈和妩媚,以水映衬出梅影的澄澈和灵动。而“暗香浮动”句则写出了梅花香气的清幽和飘忽不定,富有情趣,以月为背景营造出一种静谧而迷人的意境。可见写出梅花绝唱,是因为林逋与鹤梅的关系。鹤梅已融入林逋的生活,成了林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妻鹤子”成了千古文士佳话。

在林逋之前的唐代中期,同样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说明鹤早已进入了文士的生活,成了文士生活史的重要一页。这个故事的当事人在当时都非常有名,有名相裴度,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和张籍。

裴度,字中立,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支持宪宗削藩,代武元衡为相,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平叛为己任。他亲自出镇,督统诸将平定淮西之乱,辅佐宪宗实现“元和中兴”,以功封晋国公,世称“裴晋公”。唐穆宗时又主持征讨叛藩,但因多方牵制,最终无功罢官。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裴度数度出镇拜相,屡遭朝臣中伤。晚年他归居洛阳,以求避祸,官终中书令。晚年留守东都时,他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唱酬甚密。刘禹锡,字梦得,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留下《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最后两句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巧妙地将“晴”和“情”联系起来,具有含蓄的美,十分贴切自然地表现了女子那种含羞不露的内在感情。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题材广泛,语言平易近俗,富有情味,《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籍,字文昌,元和诗坛代表诗人,其乐府诗尤为有名,与王建并称为张王乐府。因张籍曾任官水部员外郎,所以人称“张水部”。诗人朱庆馀的一首《近试上张水部》的干谒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通过新娘问丈夫

“画眉深浅入时无”的隐喻,询问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主考官的要求,表达了自己考前忐忑不安的心情。张籍迷恋杜甫诗歌,继承了杜甫的简丽诗风而成一家,代表作有《江南曲》《江村行》《湘江曲》《泗水行》等。

鹤的故事还得从宝历二年(826年)说起。那一年白居易、刘禹锡分别结束苏州刺史、和州刺史任而北归,并相约会于扬州。大家都熟悉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称赞刘禹锡为诗中“国手”,而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则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佳句。两大诗人相会,成为诗坛盛事,传留至今。这次相会过程成了故事不断被演绎,但每次叙述都忘记了一个重要角色:鹤。鹤的重要性在日后越发显现出来。扬州玩鹤的惊艳一幕被刘禹锡简要记录下来,以至于在后来的回忆中仍栩栩如生。

刘禹锡《鹤叹》诗序记载:“友人白乐天去年罢吴郡,挈双鹤雏以归。余相遇于扬子津,闲玩终日,翔舞调态,一符相书,信华亭之尤物也。”双鹤雏,指两只幼小的鹤。一符相书,指符合相书标准。相书,指《相鹤经》。《旧唐书·经籍志下》云:“《相鹤经》一卷,浮丘公撰。”华亭,苏州属县名,有鹤,陆机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得复乎?”《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苏州华亭县”云:“华亭鹤唳,在县西三十里。……陆机云‘华亭鹤唳’,此地是也。”“华亭鹤唳”是令人悲催的事情。刘禹锡所云,只是说华亭有珍奇的鹤。刘禹锡在序中又说:“今年春,乐天为秘书监,不以鹤随,置之洛阳第。一旦予入门问讯其家人,鹤轩然来哢,如记相识,裴回俯仰,似含情顾慕填膺而不能言者。因以作《鹤叹》,以赠乐天。”今年春,指大和元年(827年)春。据《资治通鉴》载,(丁未,八二七)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大和。是年白居易在长安任秘书监。

这里的描述和初识鹤时的要点一致,重在人与物的情感交流。刘禹锡说,早上入白宅,询问他的家人,鹤便气宇轩昂地走过来斜着眼看,仿佛记得他们在扬子津的初识,徘徊俯仰,好像满怀情思顾盼流连,胸中充满了情意却不能说出口。好感动,刘禹锡简直无法自持。

鹤进入文人生活,情感交流的功能极其重要,换言之,人在物身上能发现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或者成为情感的寄托,物才真正进入文士生活,成为生活的日常。刘禹锡在《鹤叹二首》诗中同样以平等共情的姿态写出对鹤的理解:“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谁怜好风月,邻舍夜吹笙。”“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爱池能久立,看月未成栖。一院春草长,三山归路迷。主人朝谒早,贪养汝南鸡。”

唐人爱鹤,视为宠物理所当然。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唐代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仕女在赏玩鹤与犬,鹤的位置尤为突出。

我想画中的鹤只是仕女生活中的宠物,离情感寄托或情感共鸣在情境上还差几个档次。也许是刘禹锡多情的描述,白居易的这对鹤在文人圈里成了热门话题。谁都要得到这样的鹤。刘禹锡说不出口。但惦记着这对鹤的文士中有一位权重位高的人物,就是裴度。裴度想得到这对鹤是动了心思的。他以诗乞鹤,何其高雅!裴度《白二十二侍郎有双鹤留在洛下予西园多野水长松可以栖息遂以诗请之》:“闻君有双鹤,羁旅洛城东。未放归仙去,何如乞老翁。且将临野水,莫困在樊笼。好是长鸣处,西园白露中。”裴度诗题云“白二十二侍郎”,则赠鹤事在大和二

年,大和二二年白居易任刑部侍郎,张籍《和裴司空以诗请刑部白侍郎双鹤》应是同时之作。

裴诗云“闻君有双鹤,羁旅洛城东”,“双鹤”在白居易洛阳家中,刘《鹤叹》诗云“今年春,乐天为秘书监,不以鹤随,置之洛阳第。”双鹤未随主人去长安,故裴诗云“羁旅洛城东”。这也是裴度请鹤的理由之一;其二,裴诗云“且将临野水,莫困在樊笼”,可见白居易是以笼养双鹤,故裴度说与其圈养,还不如在我家放养,给鹤更大的活动空间。以裴度当时心态,或有以鹤自喻的意思;其三,裴诗云“好是长鸣处,西园白露中”,“西园多野水长松可以栖息”,裴家西园是放养的最好场所,可让鹤发出愉快的长鸣声。这里的西园规模应很大,加上和河水相连,更宜双鹤生存。后来裴度应是在故宅园林上扩建的。

甘露之变以后,裴度远离长安,归居洛阳。“时阍竖擅威,天子拥虚器,措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林,岑缭幽胜。午桥作别墅,具樊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而帝知度年虽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来,必问度安否。”可见,裴度宅第之大。

关于乞鹤赠鹤事,刘禹锡、白居易、裴度、张籍等人都有诗歌唱和,张籍有《和裴司空以诗请刑部白侍郎双鹤》,为什么张籍也参加了唱和?据载:“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流略,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调补太常寺祝,转国子助教、秘书郎。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张籍与裴度、白居易等人是有交往的。张籍有《和裴司空以诗请刑部白侍郎双鹤》:“皎皎仙家鹤,远留闲宅中。徘徊幽树月,嘹唳小亭风”。丞相西园好,池塘野水通。欲将风采此,赏望与宾同。”

张籍诗也补充了一些内容,比如进一步坐实裴度求鹤的理由,白居易因在长安做官,而将双鹤远留于洛阳的宅子里,所谓“闲宅”当指主人不在,而非无人照看双鹤,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指双鹤虽美却无人欣赏。而双鹤“徘徊幽树月,嘹唳小亭风”,不及“丞相西园好,池塘野水通”。西园的位置在张籍诗中也讲得更为具体,原来“西园多野水长松”,是裴家西园的池塘与外面的河水是可以连通的。张籍的和诗确实归纳出两大理由:“闲”着的双鹤终于有人欣赏;笼养的双鹤有了栖息的“池塘野水通”的广阔空间。

在乞鹤、赠鹤的过程中,白居易态度、风度尤佳,他在《送鹤与裴相临别赠诗》中说:“司空爱尔须知,不信吟吟送鹤诗。羽翮势高宁惜别,稻粱恩厚莫愁饥。夜栖少共鸡争树,晓浴先饶凤占池。稳上青云勿回顾,的胜在尔白家时。”白诗写得真好,首联在“知爱”,颌联在“恩厚”,颈联在“谦让”,尾联在“高迁”。如同嫁女,反复叮咛,情真意切,值得回味。而那个与鹤初遇的刘禹锡,也写了一首《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双鹤》:“皎皎华亭鹤,来随太守船(白君罢吴郡太守携鹤雏来)。青云意长在,沧海别年。留滞清洛苑,裴回明月天。何如风池上,双舞入祥烟。”他永远不会忘记扬子津“皎皎华亭鹤,来随太守船”情景。

鹤在中唐真正进入了文人生活。研究文人生活史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能够丰富文学史的内容,有助于挖掘文化传承的脉络,能够反映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还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鹤与人在中唐生活的联系,只是唐代文人生活史的一角。

## 哲学

##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

□ 周春健

所谓《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典籍。但倘进一步追究,“四书”之名又不确切,因为《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不能称为“著作”。其实,四部书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有人说《礼记》是西汉人所作),但那时都是各自独立流传的,尚无“四书”之说,《四书》的汇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南宋朱熹在前人基础上将四部书汇集在一起,并加注释,成《四书章句集注》,才正式有了“四书”之名。

### 壹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著作,是孔子及其少数弟子的言行录,大概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一书,非成于一手,非成于一时,最后的编定者可能是曾子、有子的学生,因为书中凡涉曾子、有子处皆称“子”。《论语》流传到汉代共有三种版本,即所谓“古论语”(秦)论”。“从著述体角度讲,《论语》起初并不是“经”,而是作为对“经”进行进一步简说的“传”。战国及汉初时,地位并不高。汉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立于学官,设“传记博士”。汉武帝时,《论语》地位逐渐升高,从“传”升格为“经”,列“七经”之一。唐初“九经”暂时未列,但唐文宗时的“十二经”直至宋代“十三经”皆置,而且其地位随着《四书》的结集而达到极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崇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入“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所谓《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典籍。但倘进一步追究,“四书”之名又不确切,因为《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不能称为“著作”。其实,四部书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有人说《礼记》是西汉人所作),但那时都是各自独立流传的,尚无“四书”之说,《四书》的汇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南宋朱熹在前人基础上将四部书汇集在一起,并加注释,成《四书章句集注》,才正式有了“四书”之名。

《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崇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入“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所谓《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典籍。但倘进一步追究,“四书”之名又不确切,因为《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不能称为“著作”。其实,四部书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有人说《礼记》是西汉人所作),但那时都是各自独立流传的,尚无“四书”之说,《四书》的汇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南宋朱熹在前人基础上将四部书汇集在一起,并加注释,成《四书章句集注》,才正式有了“四书”之名。

《四书章句集注》书影,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作者供图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注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收入单独从《礼记》中抽出来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 貳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同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中,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枋共著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

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分散的四部书汇集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经学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肌,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学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 and 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先当其首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是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广州大学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